

224.01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
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1/11/12

目 录

饱餐忧患气愈雄

——田君亮先生访问记……………朱立彬、尹克恂（1）

贵州光复史实……………平 刚遗稿（9）

贵州辛亥起义纪实……………莫季莹遗稿（14）

辛亥革命前后“自治”“宪政”两党斗争

见闻……………严池华遗稿（35）

贵州辛亥革命见闻……………殷亮轩遗稿（51）

贵州光复的几点回忆……………徐寿伯遗稿（65）

宪政派活动片断……………丁尚固、刘友陶遗稿（72）

赵德全之死……………黄先本遗稿（83）

※

※

※

怀念我的祖父平刚……………平明亮（85）

炸袁世凯牺牲的贵州两烈士——张先培和黄芝萌

……………徐泽庶（87）

陈奋飞小传……………平 刚遗稿（92）

戊戌政变后回贵阳的李端棻……………殷亮轩遗稿（99）

白铁肩和光懿女子小学堂.....尹克恂(101)

※

※

※

清代末年贵阳各行业概况.....蔡森久遗稿(108)

辛亥革命前后贵阳的帮会活动.....蓝克安遗稿(121)

辛亥革命前后的贵阳教育.....何静梧(127)

贵州省教育会始末.....贾功台、赵鲁丞遗稿(150)

贵山书院改办学堂的经过.....殷亮轩遗稿(155)

贵州农林学堂略历.....刘 勋遗稿(161)

科举停后贵州官立小学的变迁.....赵鲁丞遗稿(166)

记贵阳学生驱逐日籍教员冈山源六事.....曾绶卿遗稿(174)

※

※

※

黄齐生先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张雪澄(177)

“五卅惨案”贵阳学生运动的回忆

.....刘祖纯、张汝弼(183)

编后.....(192)

饱餐忧患气愈雄

——田君亮先生访问记

朱立彬 尹克恂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八十八岁高龄的革命老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君亮先生。

田老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的成员，到日本留学时又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七十年来，为革命奔走不息，并从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迈入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先进行列。田老由于早年腰腿受伤，行动不便，但很健谈；每次造访，可连续谈上三小时还余兴未尽。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接谈中又受到很大教益，宛若置身于三十年代的课堂里，聚精会神地在他的谆谆教导下去领略人生的真谛。

话题是从辛亥革命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光辉形象开始的。

田老回忆道：早在他少年时代，由于废科举、创新学，官立、私立的中小学堂纷纷开办，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以培植人才、联系大众、健全基础、灌输新知识为己任，做了许多工作。在他们的启发下，在民族英雄故事、历史故事的感染下，他痛恨清朝政府对内残暴镇压、对外丧权辱国，一心想为国家民族多做点事。年岁稍长，血气方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传入贵州，书刊中宣传的推翻清廷、反对列强、振兴中华的思想，使他受到极大鼓舞。田老说：“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革命前辈平刚先生剪了发辮被通缉。现在看

来，剪根辫子有啥稀奇，但在当时，是有可能掉脑袋的。剪辫子表明反清决心反到底。平刚先生剪了辫子，跑到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来就是贵州同盟分会的会长。”田老很喜欢同平刚先生接近，后经张文林先生介绍参加自治学社，“建设现代贵州，参加国民革命，实现驱虏复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渐渐深入脑际。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旧历九月十四日），贵州军政府成立，田老当时是模范中学学生，曾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热烈庆祝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胜利，且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省谘议局举行的绅、商、学各界庆祝大会，会后带头剪掉了发辫。

回溯往事，田老深有感慨地说：“由于辛亥革命革得不彻底，虽然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但帝国主义势力并没有动摇，被瓜分的危险并没有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十分严重，去掉一个清朝皇帝，出现袁世凯等一批大小军阀，正象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怎么办呢？一切革命者面对此种现实，都不能不给自己提出个疑问。”

具体到贵州来说，情况更严重了。田老谈起他“东走扶桑”和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艰险历程：“贵州光复后，自治派与宪政派的权力之争加剧，革命力量遭到摧残。当时我还年轻，对时局缺乏分析，但革命热情并未受挫。这时，孙中山先生因‘二次革命’又告失败，深感国民党涣散无力，便于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我为了找寻革命真理，于一九一五年东渡日本，考进早稻田大学，同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我在日本，生活极简单，住的是四铺半席子的简陋房间，但意

气自若；每晚七至十时，与几个志同道合者畅谈天下大事，十时后认真攻读，有时到深夜一点。”

田老说到这里，特别兴奋地回忆起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九年间留日学生总会的几次活动。他说：“我们留日学习期间，身在国外，心怀祖国，外交上的得失成败，成了经常话题。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借助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他的皇帝梦，竟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消息传来，大家愤慨地聚集到留学生总会办公室商讨对策，激于爱国热忱，我们有十二个人（包括两个女生）实在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冲向驻日公使馆，准备把公使章宗祥抓起来打一顿；从前院追寻到后院，没有抓着，只好悻悻而归。后来才知道三天前章贼已逃返北京。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和会，军阀政府的外交官们，竟然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意把战败的德国，原在我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拱手转让给日本，这种‘战胜国’的卖国外交，凡稍有国家、民族自尊心者，都会觉着是椿奇耻大辱。我们四十余个自费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后，决心离日回国，投入反对占领青岛、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的反日斗争中。大家推举我作代表向管理留学生经费的周经理员商借路费，他先是不肯，还劝我好好读书，少搞社会活动。我晓以革命大义，又妥善安排还款办法，他被迫同意了。于是我们专程赶回上海，搞了约莫两个月的宣传。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烈火燃遍祖国大地，我们在东京的留学生，听到火烧赵家楼，痛打曹、陆、章的消息，既高兴又气忿。各省学生代表汇集上海后，拟成立全国学生总会，函请东京留日学生总会派代表参加，我作为四个代表之一，赶回上海，参加全总评议部的工作。我们不仅在街头演讲，还表演爱国话剧，唤醒

国人，抵制日货，也惩办了一些贩卖日货的奸商。搞了三个多月，又返回日本，大学也就快毕业了。”通过这些年的坎坷，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青年时代的田老奠定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他曾赋诗两首，表述自己的革命人生观：

“肝胆心胸，众忧众乐，
布衣草履，意气自若，
独往独来，幽探隐索，
如何利世，心常琢磨。”

“天地荡荡，任我飞跃，
东走扶桑，返不停脚，
奔走革命，险阻忘却，
要把社会，由苦变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田老在上海。为什么要从上海回贵州呢？田老说：“在军阀割据、内外交困中，反对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成了孙中山先生爱国斗争的一项迫切任务。绝望里，孙中山先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毅然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可是，国民党里，也有所谓‘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我写文章批驳他们的谬论，并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建议孙中山先生：北洋军阀不倒，国无宁日；实行三大政策，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这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领导革命运动，他指示各省青年回家乡进行北伐的宣传发动工作。我响应号召，赶回贵州，决心鼓动本省文、武官员参加北伐。”

田老回贵州，正值川军第一军熊克武部由黔桂边界退驻镇远。熊克武是老同盟会员，忠实追随中山先生，准备以贵

州为基地伺机北伐。田老经同盟会员方竹君推荐，受聘于该军第二混成旅，担任秘书长职务，趁机宣传策动。通过随军北伐，从贵州江口到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原计划经鄂西下宜昌，与广东来的部队会合，由于代军长罗觐光在川东被擄为川军后备军总司令，留连乡里，忘记革命目标，田老愤而离川经湘、鄂重返贵州。

谈到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田老深情地回忆了几次晋谒孙中山先生的情景。他说：“我不仅在上海见过孙中山先生，还在桂林、广州见过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不喜欢人们称他官职，要我们叫他先生。与他见面，丝毫不感到拘束。在桂林晋谒先生的，除我和安健外，还有其它地方的代表十多人，孙夫人宋庆龄也在座。先生耐心听完每个人的发言和提问，并逐一解答，直到大家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先生仔细询问了贵州的一些情况，并就人事安排问题征询我们的看法。”“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毫无个人私利而有崇高精神境界的革命先行者，临终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确是远见卓识。”

我们问田老，为何抛弃军旅和仕途生活回乡执教呢？田老说：“这是辛亥革命对我的启示，更是共产党给我的教育。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皇帝总把自己说成受命于天，各级官吏则把自己说成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其实，所谓父母官，尽干缺德事，自己做一个洁身自好、有益于人民的官吏行不行呢？基本上不行。所以说，不把旧传统、旧观念从人们思想深处连根铲除，封建僵尸还会借尸还魂，子孙后代也难免受其害。”我们追问一句：“所以你决心在教育战线做一点有益于民众的事，对吗？”田老笑着说：“对！对！”

从一九三〇年起，二十余年间，田老先后在南明高中、贵

阳中学、贵阳女中、贵州大学任教，讲授国文和人生哲学。

田老说：“我的宗旨是以进步理论教导学生，教出一批革命的人。”他结合教学，曾经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批判封建的宗法关系、特权观念和唯利是图思想。他不只一次告诉我们：“为人不能当自了汉，众人不好，一个人是好不起来的。”他在贵大曾以“我”字为题发表演讲：“千千万万社会的人，就是千千万万的我，应该当个什么样之我呢？鬼混之我吗？贪图小名小利之我吗？护黑暗、助黑暗之我吗？创新时代之我吗？总要慎重思考。”为了鼓励后进者的创新精神，田老还经常说：“学我者死！”意思就是青年应走在时代前头，学习新事物，创造新事物，既要学先生，又不能光学先生，否则社会就停滞不前了。

这样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受教于田老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成长起来，一个又一个地踏上革命征途，还有些同学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壮烈牺牲。这是田老最感动的事情了。当然，这些活动岂会不引起反动派的嫉恨呢？反动当局曾采取若干卑鄙手法加害于田老，对此，他赋诗明志道：

“是非憎爱世偏多，难以强求奈我何？

宽却肚肠迎笑骂，豁开心地浴风波。”

“古今重定立新体，人已相期破旧窠，

改天换地福人类，应学工农老大哥。”

田老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迎接一个“改天换地福人类”的新世界，田老不仅“迎笑骂”、“浴风波”，而且甘冒生命危险，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来说明自己与革命派原是同一阵营而且同一战斗步伐的。当我们还是孩提之年，就听到“二亮闹文通”的传说了。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二年，

“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山城百姓，为了抗日救亡，以秦天真、丁树奇为首的革命学生，挺身而出，组成“贵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沿街演讲，查封日货，这原是拯救国家、民族的壮举，但身为教育厅长的陈公亮，却心怀叵测地在文通书局门口对老同学田君亮先生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田老说：“抗日何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是国家民族之大幸，怎么能诬为共产党呢？”双方辩论不休，田老气极，手执烟杆教训陈公亮。从这件事可以看到，田老的爱憎是何等分明啊！为了促进抗日救亡，田老参与发起成立“沙驼话剧社”，开展进步的文艺宣传活动。当团结抗日的战争打响以后，田老又以极大热情关注于反对投降、倒退、分裂阴谋。一九三八年，田老曾与教育界知名人士吴澄华、郭奕群、刘方岳、肖家驹、梁园东、赵毓强等筹组社会科学座谈会，既是讨论社会科学，又是从理论上和现实斗争中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当斗争处于低潮，敌人准备对革命派狠下毒手时，田老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派一边，并帮助掩护了如于蕴、杨天源等同志安全转移。田老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也是我们最可信赖的同志。

在这次采访结束前，田老拿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光辉文献，深有感慨地说：“正如《决议》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也好，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也好，都没有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行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未

竟的革命事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经过艰苦奋斗完成了。不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固然是决定性的，传统思想的改造也很重要。我们经历了七十年的伟大变革，受过形形色色的忧患，挨过来自各方面的棒子，这样很好嘛！经得住棒棒才干得好革命。在当前的‘四化’建设中，我们也有居安思危、闯险排患的勇气呵！”

最后，田老口占七绝四首，表达自己对于光明未来的无比信心：

其一：

饱餐忧患气愈雄，“忧患如山一笑空”，（注一）
妙悟多从棒下得，真知常在困时通。

其二：

乐观心自乐无穷，恰似春来扫去冬，
和风暖日凝胸内，万紫千红殖意中。

其三：

狂笑八经（注二）老眼睁，风云黯黯五洲惊，
世患根消终有道，列宁肝胆马恩心。

其四：

未来世界绝非今，人类争挖剥削根，
四海波红淘旧去，五洲产共铸新生。

一九八一年十月七日

（注一）语见陆游诗。

（注二）经，经过之意。狂笑八经：第一回，指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第二回，指滇黔护国之役，各省响应，打倒袁世凯；第三回，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倒北洋派；第四回，指日本投降，国家危而后安；第五回，指驱蒋出大陆，远窜台湾；第六回，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七回，指林彪叛国，飞机坠毁而自取灭亡；第八回，指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使国家得以安定团结。

贵州光复史实

平 刚（遗稿）

编者按：此文系平刚先生于一九四七年的一次发言稿，我们保留了叙述史实部份，对议论部份作了必要的删节。

今天是贵州光复三十六周年纪念日，当时本人年仅三十余岁，而亲身参与其事，现在年已七十余岁，各位要我来报告光复经过，恐因精力不济，言语迟缓，容有遗漏之处，尚望各位体谅。

过去贵州在十八行省中，算是最偏远的，今天与他省相较，尚且落后，三十六年前的情形，更无论矣。以情理推测，贵州似不致发生革命，但是只要有心人，一样会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来。

甲午中日之战，我以十倍于日本的力量，而竟败于日本。甲午战后至戊戌，四、五年间，国人力图改进现状，长江一带，形成两条路线，一曰维新，一曰革命。前者是广东人康有为等所提倡，出以稳健，旨在保存清室，慢慢改革；后者即为孙中山先生提倡，力主推翻清朝，建造民国。当时贵州一般人皆以保皇维新，不犯危险，颇受康有为路线的影响。本人当时年仅二十二岁，波浪所逐，为贵州首先接受孙中山先生路线的第一人，盖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收真正功效，于是乃剪去发辫以示决心，因为官府所不容，乃被迫出走。

回忆本人出走后想法，只有到日本才有办法，于是决心

东渡。因毫无凭藉，曾有友人劝阻，但我以为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可以去得。当时凡往日本的人或留学生，都须请由政府发给出洋照会证明，即是护照，否则不能进入彼土。我因事出仓卒，又是政府认为大逆不道者，如何能得护照？及船抵长崎，日警索取护照，因言语不通，由日本警察写字示意：如无护照，即不允登陆。我也在纸上写字答复：你们日本伊藤博文从前革命反对德川幕府，被迫逃到荷兰，在荷兰船上伪装伙夫，难道也有政府的护照吗？我是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份子，他们如何肯给我护照呢？因为日警略懂汉文，他见我这样写出，立刻誉我是“好角色”，允我登陆。

我出走日本，是因为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我作一对联以讽之，政府下令缉拿，不得不走避。当时在贵州信奉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者，仅我一人，离贵州后，复得张恺普、蒲劭光、彭明之等三人赞成。至戊申年（一九〇八年）贵州始由张石骥（百麟）发起组织自治学社，首要者有黄芴青、陈兰生诸人。自治学社成立后，三君积极向外县发展，首先从学堂培植革命干部入手。除我先时创办的乐群学堂外，尚有公立法政学堂、法官养成所、光懿女学堂等。此外有谘议局，即是今日之省党部地址，为乐彩澄先生所创修。时乐任议长，表面与自治学社无关，实则赞助其一切主张。戊申年，余在东京时张石骥写信给我，托转达中山先生，愿将自治学社加入东京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惟为避免清廷注意，仍保留自治学社之名，以便活动。经孙中山先生认可后，并派我为贵州盟长，即贵州同盟分会主持人。斯时，孙先生所领导之广州、兰州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的中央，乃下令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本人遂于庚戌年（一九一〇年）返回贵州。

我自返省后，即与张石骥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

起事。次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举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贵州愈加速扩展组织。农历八月，湖北武昌起义，湖南响应，并电贵州囑即响应。当时贵州行政方面，分为十三府四十四州县；军事方面，分四镇八协，设提台（时提台为徐月亭）统率，驻节安顺。全省共有绿营三千人，在太平时期，此三千人即可镇慑全省。清政府自与日本战败后，鉴于绿营不可用，开始训练新军。贵州成立新军一标，约六、七百人，由江苏人袁义保任标统，驻扎于今之南厂，队官多湖北人，并同情革命者。旋复成立第二标，标统董福开，乃同盟会员，尚未组成，因四川铁路风潮，端方被杀，第二标即奉调入川。本人返省后，先派黄芴青加入新军营任书记官，以资联络。此外抚台卫队有一百二十人，多湖南人，训练有素，且系炮队，乃派湘人谭景周劝说其队长彭尔堃，彭亦颇赞助革命。另有陆军小学五百余人，提调为川人廖子明，与我友善。故上述三部份，均属意于革命党，这是武的方面。在文的一面，谘议局十分之八的议员及贵阳教育总会、法政学堂、法官养成所与乐群、光懿等校，亦属意于革命党。报纸方面，我们办有《西南日报》一种。与自治学社反对者为宪政预备会，参加他们的人既少，力量甚微，他们也办有《黔报》，常与《西南日报》互相抨击。

反正前一年，云南总督李经羲行经贵阳，宪政预备会密告贵州有革命党人，列为首八名请李缉拿，欲致之死地。张石骥有胆有识，径往见李经羲，陈述革新意见，李甚赏其才识，反囑巡抚庞鸿书，必资重用，以资笼络，庞遂请张主文案。当时贵州所有力量，既十分之九属于革命党人，武昌起义，贵州即准备响应。清官府与宪政预备会为应付当时环境，有主张杀革命党人者，有主张设法缓和者，结果由蔡衡武

及地方绅士出面主张组织自保会，表面上不表示反清政府，并藉此与武昌方面虚与联络。革命党人多反对此议，惟张石骢佯允之，并准备于九月一日，抚台循例在南厂阅兵时起事。旋以时局不稳，抚台停止阅兵计划，以致未果。乃于九月十三日夜，在白沙井张石骢公馆聚议下令从新军营发难。

先是武昌起义后，官府为防患未然，藉打靶为名，将新军营及陆军小学子弹耗尽，并已组织自保会，以为可以相安无事矣。当时枪枝子弹，均存于火药局，殊有该局徐耀卿，因事被押，由张石骢说情得释，徐献子弹一箱为酬，乃以一部份交杨树清配发新军营，一部份由胡刚、胡仁配发陆军小学。新军得弹，群情兴奋，即于是日夜哗变。标统袁义保闻变出问，众欲拥其为首起义，袁不允，杨树清即鸣枪一响，弹由袁头上飞过，袁大骇逃窜。教练官杨荃诚即问新军，是否真要革命？众答真要革命！杨即表示他原为东京同盟会员，遂被拥为首领。是时原任抚台庞鸿书，因被宪政预备会人买合御史陈田，奏参庞老耄昏愎、纵容革命，去职，刚由沈瑜庆继任。新军举事后，即以电话告沈，沈急调卫队架炮防御，殊队长彭尔望已将炮机送缴张石骢公馆听命矣。沈知大事已去，无法挽救。陆军小学方面，是夜有某人往劝，说汝等既无子弹，不可妄动。及出示枪弹后，某复劝且待新军消息，并以校外已有巡防队包围恫吓。旋闻新军传来消息，袁义保已三枪毙命，陆军小学立时响应，而巡防队亦解围宣布参加革命。

十四日（阳历十一月四日）晨，新军与陆军小学学生，分由大南门、次南门进城，齐集谘议局听候张石骢宣布举义意义及经过。当时我正卧病在家，闻讯霍然而愈，家人劝阻不住，立赴谘议局，被推组织军政府，成立立法院及军政府民政部等。

在未光复之前，由张石骢、黄弗青、陈兰生三人，分函

各县调集哥老会份子来省。反正之日，有七八百人抵达省垣，故纵使新军不发难于先，而革命亦在所必行。事后，即将所有武力，分编东南西北中五路分统，由黄弗青任巡防总统事。是时有兴义刘如周（显世），因其父官礼，曾以子弟兵击退广西游勇，保卫盘八安宁，故拥有一部份武力。当沈瑜庆感觉新军及陆军小学不可靠时，宪政预备会诸人，即建议沈急调刘如周率子弟兵来保省垣，刘率徒手兵五百人抵安顺时，省垣已告光复。时在军民两政之间复设一枢密院以联络指挥，我即被推主其事，刘在安顺闻省垣光复，即不便进军，先来一函与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大意谓：“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我拆阅之后，认定刘乃虎而冠者，主张拒而不纳，能除去更好。殊张石麒不以余言为然，以为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目的，此时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遂复信允应。比刘部进省，并发给枪弹，委刘为西路统带。

我知祸之将及，遂藉湖北来电请各省推派代表赴武昌，筹商组织中央政府之机会，以贵州代表名义，以原来抚台卫队百二十名护送出省。抵武昌后，又改集议于南京，由十七省代表——甘肃及东三省在外，决定去电美洲，请孙中山先生返国。旋经一致投票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黄兴为大元帅。武昌起义原非黎元洪本意，及被推任都督，始从众请。孙中山先生被选临时大总统后，武昌方面来电反对，后由南京代表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后，始无异议。

本人离省不久，而贵州乱作，刘氏盗黔，而张氏走桂，不幸言中，可胜浩叹！

贵州辛亥起义纪实

莫季莹（遗稿）

前 言

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国内一切民族都沦为被清廷压迫的民族，最恶毒的是封建统治者不断地挑拨离间各族人民的团结，使各族人民互相仇杀以便巩固其压迫与剥削的专制政权。因而在整个清代，各地农民起义与各族人民不断反抗斗争，经常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光绪年间，对外签订各种屈辱卖国条约，让帝国主义取得在华一切特权，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干涉中国的内政。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事实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主奴交互勾结利用，共同向中国人民进行残酷无比的压榨，人民穷苦无告，只有用革命代替控诉，以求生路。

十九世纪末，各地抗捐、抗税不断出现，如云南昭通数千人起事，热河平泉数千人烧毁税局，阿木尔聚众放火攻城等。我们贵州各地义师兴起，历年俱有所闻。以独山为例，仅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六至二十八年），